

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工作小组暨中心举行工作会议

2007年9月24日，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工作小组暨《儒藏》编纂中心在逸夫一楼举行新学期第一次工作会议，研究近一段时期《儒藏》编纂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。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有、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，《儒藏》总编纂孙钦善、安平秋，《儒藏》编纂中心副主任吴同瑞、常务副主任魏常海，工作小组成员李中华、陈来、张玉范、张衍田、陈苏镇，北京大学出版社典籍与文化事业部主任马辛民，以及《儒藏》编纂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。会议由《儒藏》工程首席专家、《儒藏》编纂工作小组组长、《儒藏》编纂中心主任汤一介主持。

魏常海副主任首先通报了暑假期间三次会议的情况。

7月23日，张国有副校长、社科部耿琴副部长到汤一介先生家，与汤先生、魏常海副主任见面。汤先生首先通报了《儒藏》工程的进展情况，包括收到完成校点的稿件数目、能够成册的册数及撰写《中国儒学史》、编纂《儒藏总目》的进度，也谈到如何保证《儒藏》工程质量的关节点。其次，谈到中心的初审力量、出版社的编辑力量都不够，准备招聘全职的临时工作人员。第三，谈到《儒藏》工程合作单位存在的问题，主要是合作单位没能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提供足够的支持。对此中心已作过调查并研究应该采取何种办法改进。第四，谈到经费问题，见面时，今年的经费还没到位。目前，教育部今年的经费100万元已到位，北大今年的配套经费100万元也已到位，张国有副校长认为都应划拨到中心来。中心需要有一个办公室主任的编制，希望能够解决。

其后不久，北大出版社王明舟社长、杨立范总编、马辛民主任到汤一介先生家，与汤先生、魏副主任见面，商量中心与出版社如何加强力量、分工合作的问题，双方同意联合招聘负责初审的合同制工作人员。

在以上两次会议的基础上，8月13日，张国有副校长主持召开《儒藏》出版工作小组会议，出席会议的有北大出版社王明舟社长、杨立范总编、马辛民主任及总编助理、市场营销部主任等，《儒藏》编纂中心魏常海副主任及杨韶蓉、李畅然、沙志利等。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：

一是关于如何保证《儒藏》的质量，主要包括部类主编和校点者的编纂校点质量、中心与出版社的编审校对质量和印刷厂的印刷装帧质量。会议要求中心：应与校点者直接联系，明确校点者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职责，具体抓四个环节：校点者的校点环节、编审专家的通审环节、复审复校的环节、出片后责任编委和责任编辑共同把关的环节。会议要求出版社：第一，负责对通审后稿件的录入，清样的错误率控制在万分之一以下（王明舟社长要求排版清样的错误率应控制在万分之零点八以下）；第二，王社长特别提出，稿件交出版社加工必须有文字记录，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反馈给编审专家；第三，每册书出片后由中心的责任编委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共同把关，再审一遍，以免出错；第四，装帧、印刷质量需要改进。

二是关于如何加快《儒藏》的出版速度。目前中心已收到完成稿件 156 部，其中已作过初审的稿件 119 部，已作过通审的稿件 74 部，交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成稿 46 部；《儒藏》精华编第 104 册、第 281 册（共包括 15 部典籍）已于今年 6 月正式出版，预计今年还可成册 28 册（共包括 67 部典籍）。由于部类主编把关不严以及校点者的态度、水平不齐，已收稿件中有 59 种（约占已初审稿件数的 50%）不合要求，需要退改。王社长提出应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，加快出版的速度。张国有副校长要求今年争取出版 30 册。尽管依目前的进度，按期完成任务确有困难，但会再作努力。现在中心已认识到影响《儒藏》编纂质量的问题也就是影响《儒藏》出版速度的问题，由于许多稿件质量不合要求，退改率偏高，审稿工作量偏大，因此还是应先在提高校点质量上下功夫。今年可以先争取出版 10 册，再逐渐加快出版速度。

三是关于如何扩大北大《儒藏》工程的影响。张副校长提出《儒藏》出版一批后可以作些宣传工作，如请学界人士进行评论、请有关领导作讲话或批示、请北大国际合作部作海外宣传等等。

四是关于《中国儒学史》和《儒藏总目》的进展情况。争取在 2008 年北大 110 周年校庆时推出《中国儒学史》，争取在今年 11 月底完成《儒藏总目》“经部”的编纂工作，年底出版。

汤一介先生在工作会议上对将于今年 12 月初在深圳大学举办的“《儒藏》主编工作会议暨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的具体安排作了介绍。深圳会议将分两部份进行：一是部类主编工作会议，研究如何加强部类主编与校点者的责任，着重改进校点者的工作；二是为配合启动《儒藏》研究项目，请学者介绍与《儒藏》有关的项目研究状况，如易学、尚书学、诗学、礼学、春秋学、诠释学等的研究状况，提出有关的研究选题。汤先生还介绍了

筹办《〈儒藏〉编纂与研究》集刊的情况。

在此次工作会议上魏常海、孙钦善先生还分别介绍了走访武汉、上海等地的合作单位以及在上海建立编审专家组的情况，详情见本期的相关报道。

与会人员对会议通报和情况介绍提出了看法和建议。安平秋先生提出选择和更换合作单位及校点人员要慎重，中心应加强与校点者的直接联系，同时应充分发挥部类主编的作用。吴同瑞先生同意进度和质量应该是统一的观点，并指出关键是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；抓质量，光靠加强北大的力量还不够，应提高合作单位的认识，要发挥出版社老编辑的作用；深圳会议应研究加强部类主编的工作和改进《儒藏》的校点质量；希望大家要有将《儒藏》工程作为千秋大业来抓的责任心。程郁缀部长提出《北京大学学报》对《儒藏》工程可以大力宣传，有关《儒藏》工程的学术通讯可以作为学报的补白，每年6期学报可以连续刊载有关《儒藏》的书评。

大家发言后，张国有副校长作了讲话。他指出《儒藏》工程是教育部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，目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，现在将问题和困难摆出来，大家共同研究如何解决。原来曾提出今年要出30册，目前看来完成任务确有困难。但先不要退，定下期限和工作量就不要退，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，届时再回过头来扎扎实实地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。目前要加强催稿工作，在保证质量的同时，将期限往前排。部类主编这个环节，由于负责的程度不同，容易成为误工的环节，造成信息截流或流失，因此应更多地与校点者见面、沟通，并与部类主编商量如何做更好，和谐地解决这个问题。有些问题在《〈儒藏〉工程工作手册》和《〈儒藏〉工程校点手册》里都有解答，但有关人员没能及时了解，可以通过《儒藏通讯》，将问题集中提出来，直接提供给部类主编和校点者，也可以直接派人走访合作单位，这些都是解决工程进度和质量的办法。程郁缀老师主编的《北京大学学报》可以帮助宣传。北大出版社又进了一些人，可以加强编辑力量。由于《儒藏》工程规模浩大，有些问题也无法事先都估计到，目前的工作已经做得不错，当然还要精益求精。

汤一介先生最后说，《儒藏》工程需要大家的支持，学校各方面对《儒藏》工程是大力支持的，吴志攀副书记、张国有副校长都给予了很多支持，社科部也给予了很多支持，希望各方面继续给予支持。

(胡仲平)

走访华中师范大学的情况简报

2007年9月5日至8日,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中心魏常海副主任及胡仲平、谷建、沙志利走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历史文献学研究所,以沟通《儒藏》审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,受到王玉德院长及华中师大同人的热情接待、积极配合和周到安排。

华中师大负责校点《儒藏》集部南宋别集24种中的22种,共组织了21位校点者,其中15位为该院的教师,队伍较齐。他们已完成稿件16种,其中15种经过初审,1种为这次去时见到,其余稿件的校点也在进行之中,进展较快。

这次走访的前期工作做得较充分,中心人员已对收到的稿件作过初审,掌握的情况是:尽管部分稿件质量较好,但稿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,不完全符合《儒藏》体例和质量的要求,部分稿件存在的问题还较严重。

这次走访的方法:由王玉德院长组织校点者轮流来历史文化学院会议室,由中心人员根据每部稿件的初审意见,逐条与校点者沟通。初审意见涉及:版本源流的考查、底本与参校本的选择、校点说明的内容、校勘记的规范(格式、字形及应否出校等)、标点与分段的要求。经过交流,校点者基本上都能接受初审的意见,如重新调查版本、更换底本和参校本、补足缺漏文字、规范校勘记的写法、重新标点断句和分段。中心承诺按照校点者提出的要求,尽量尽快提供合作单位难以取得的底本和参校本。

通过初审和面对面交流,中心了解到许多校点者态度认真负责,并能提供独特的工作经验。李国祥教授认为应先仔细通读选定的底本并标点,疑难之处标出,再参考参校本和已出校点本,并认为极有可能正是这些疑难之处应该出校。杨昶教授对底本中遗漏、模糊的文字采取直接据参校本补足,而在校点说明或首出校勘记中加以说明、在正文中用括号标明的方法。这些经验都值得推广。

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,取得了这样一些收获:一是使得部类主编和校点者进一步明确了《儒藏》工程的质量标准及具体规范;二是使得校点者能够更清楚初审意见的要求,并经过讨论、研究后参照修改;三是校点者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采纳推广;四是使中心更具体地了解到部类主编及校点者的编校情况,据此可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,如重申要求先

提交样稿的环节以免事倍功半，质量实在难以达到要求则应建议更换校点者等等；五是使中心认识到自己的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，有些信息并没有及时传达到部类主编和校点者，还应加强与部类主编及校点者本人的直接沟通。

(胡仲平)

上海审稿专家座谈会纪要

2007年9月13日,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中心在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1403召开上海审稿专家座谈会。《儒藏》编纂中心汤一介、孙钦善、张玉范、谷建、沙志利及曹明纲、丁如明、曹光甫、史良昭、李剑雄、李祚唐、王海根、罗黛娃、郭忠新、杨军等10位分别来自上海古籍出版社、汉语大词典出版社、苏州科技学院的审稿专家出席了本次会议。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商讨成立上海审稿专家组。

会议首先由汤一介先生介绍《儒藏》工程的情况。《儒藏》工程自2003年以来先后在教育部、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“十一五”规划立项,由北京大学牵头,联合国内20余所高校和研究所通力合作,共同完成。《儒藏》工程设有领导小组、工作小组和编纂中心三个机构,并设有《儒藏》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。目前正在进行的是《儒藏》精华编461种的编纂工作,已收到稿件140余种,之后将编纂全本《儒藏》约5000种,此外还将收入日、韩、越三国学者用汉文撰写的儒家著作,编为域外文献部分。《儒藏》精华编采用标点排印加校记的形式,方便使用,并便于今后做成电子版。

孙钦善先生向各位审稿专家介绍了《儒藏》工程的审稿工作流程以及北京审稿组的经验。审稿专家应在熟悉编纂条例、凡例和补充说明的基础上,选择个人擅长的领域,对稿件质量进行把关,发现问题的时候有改定权,有权处理稿件。希望《儒藏》精华编能在各位审稿专家的努力下得到层层把关,保证质量,并对已有的成果有所超越。张玉范先生随后强调了版本选择的重要性,并介绍了《儒藏总目》的进展情况。

在座谈阶段,各位审稿专家用自己多年来丰富的工作经验为《儒藏》精华编稿件质量的提高、工作流程的改进等方面提供了很多意见和建议,主要包括:第一,编纂条例、体例及补充说明中需要改进和明确的地方。如李剑雄先生指出“某公某年”加书名号的规定不妥,版本简称也应当标书名号;郭忠新先生指出作者原文避讳“一般不改”,最好明确为“原则不改”;李祚唐先生认为校记格式中“无此字”的后二字可删,更符合简明校记的要求。第二,关于异体字、俗体字的处理。郭忠新先生建议一律不改,史良昭先生认为以一本书之内统一为好。第三,关于工作量问题。李剑雄先生认为,复校时抽审的比例应

明确，同时质量越差的稿件审稿专家工作量反而越大；曹光甫先生指出通审退改后再进行通审时，工作量是否有相应的计算方式；史良昭先生建议复校时应再通读一遍稿件，李剑雄先生表示支持，但这样时间和工作量亦会随之增加，应如何解决。第三，关于版本。李剑雄先生强调电子版不可靠，尽量不用；李祚唐先生谈到影印本存在的问题，比如《四部丛刊》，并非原原本本影印，而是有所修描，不完全可靠，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核对原底本。审稿专家还针对个别细节问题提出了建议和要求，如李剑雄先生提议稿件的初审、通审可使用不同颜色的笔来标明，以明确责任人和流程，便于工作开展；曹光甫先生指出《儒藏》精华编书脊上应列有本册书名，以便翻检；王海根、杨军二位先生都强调了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利用。此外，关于审稿专家的署名、稿件寄送、审稿酬劳等问题，也在会议上得以一一解决。

最后，中心向与会专家颁发了聘请信，并对他们各自擅长的领域进行了初步了解。

(谷建)

上海市校点者座谈会纪要

2007年9月14日，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中心在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1403召开上海市校点者座谈会。来自华东师范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复旦大学以及苏州科技学院四家合作单位的10位校点者以及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中心孙钦善、张玉范、谷建出席了本次会议。

会议由孙钦善先生主持，他首先介绍了9月13日上海审稿专家座谈会的情况，希望邀请华东师大古籍所退休教师今后参加审稿工作。关于《儒藏》精华编进展情况，目前已收到稿件150部左右，发稿70余部，出版两册。目前分册已确定，采取滚动式出版的方式，完成一册出版一册。《儒藏》精华编采用标点排印的形式，主要考虑到这是现代社会的需要，方便使用，有利于出版电子版，进行数字化处理，并提供读者一个最好的文本，而影印则容易造成大量重复。孙先生强调质量是《儒藏》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，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，这需要校点者抱有文责自负的心态，选人应严格，主编要认真把关。孙先生介绍了中心的审稿流程，并强调了样稿制度的重要性。在一些具体问题，如异体字处理上，尽量不改，可做适当统一。希望《儒藏》工程能在各位主编和校点者的共同努力下，在底本、校勘、标点等方面超越前人。张玉范先生在随后的发言中再次指出应重视底本的选择，尽量选用最好的本子。

几位主编相继介绍各自部类的进度，并总结了组织校点工作的经验。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先生介绍子部·儒学类·性理之属的情况：上海师范大学共承担6种，其中2种已交稿（《知言》、《北溪字义》），《龟山语录》、《木钟集》、《崇正辩》已经完成，会后便可交上，《真西山读书记》需要北大复制底本，争取年内完成。陈卫平先生认为条例规定不使用专名号是明智之举，《儒藏》作为一个大工程需要考虑如何保证风格统一。华东师范大学严佐之先生介绍朱熹及相关著作的情况：华东师大在《朱子全书》的基础上开展工作，进展比较顺利，目前已交稿13种，所余数种《朱子语类》、《朱熹集》部头较大，而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刚刚列入史部计划，预计《朱子语类》可在半年内完成，寒假以后交稿，其他稿件因部头较小，有望近期完成。严佐之先生强调选择版本时要进行深入调查，当前的

文献再造工程对研究具有重大意义。苏州科技学院的杨军先生介绍子部·儒学类·经济之属的情况：苏州科技学院共承担 21 种，目前已交稿一半，6 种尚未完成，《大学衍义补》计划年底完成。杨军先生谈到了校点者的选择标准，应充分考虑学术背景，有古籍整理经历，基础较好，基本功扎实，为人敬业、虚心。

最后，校点者根据自己校点工作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座谈。华东师范大学徐德明先生介绍了《朱子全书》的经验，即校点工作开始前，先做简明目录，罗列版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他负责校点《论语集注》时，所用的底本为淳祐本，直到样书出版时才根据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核对了真正的淳祐本，但《再造善本》也存在一定的改动、脱页情况。华东师大古籍所的学术氛围很好，疑难问题往往是经过集体讨论解决的，因此在质量上有望超越中华本。复旦大学的校点者张旭辉先生负责校点《经典释文》，以宋元递修本为底本，他担心今后排印时会出现很多错误，徐德明先生建议类似不好排印者是否可考虑采用激光照排的方式。关于异体字的处理，严佐之先生建议尽量不改，但本书内最好统一，因为对于某些部头较大的书而言，当时刻工、抄手并非一人，习惯不同，从而造成了人为的差异。关于审稿，杨军先生提议，还可考虑聘请该领域的专家进行通审。校点者提供的宝贵经验和建议，是《儒藏》工程提高质量的保证；《儒藏》编纂中心和校点者之间直接进行沟通和交流，也有利于校点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(谷建)

來稿照登：

《四庫全書總目·周易口義》辨誤

——審稿之一見

郭 彧

近來，初審山東大學劉寶貞先生校點的北宋胡瑗《周易口義》一書，因只有《四庫全書》一種版本，遂連同四庫館臣所寫提要一併收錄而有校點。

我們的《儒藏》工程，於精華編中收錄《周易口義》，主要因為它是一部在歷史上有過很大影響的書，特別是程頤曾經嚮當時的學者推薦過讀這本書。南宋乃至清代，程朱易學立於學官，既然程頤“講《易》多本於翼之”，所以胡瑗《周易口義》一書的地位可想而知。然而，四庫館臣為《周易口義》所寫的提要，卻是舛誤多多。

今試分析如下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·周易口義》提要：

《周易口義》十二卷，宋倪天隱述其師胡瑗之說也。瑗字翼之，泰州如皋人。用范仲淹薦由布衣拜校書郎，歷太常博士，致仕歸。事蹟具《宋史·儒林傳》。天隱始末未詳，葉祖洽作《陳襄行狀》，稱襄有二妹，一適進士倪天隱，殆即其人。董弅《嚴陵集》載其桐廬縣令題名《碑記》一篇，意其嘗官睦州也。其說《易》，以義理為宗。邵伯溫《聞見前錄》記《程子與謝湜書》，言讀《易》當先觀王弼、胡瑗、王安石三家。三原劉紹攽《周易詳說》曰：朱子謂程子之學源於周子，然考之《易傳》無一語及太極。於觀卦詞云，予聞之胡翼之先生“居上為天下之表儀”。於大畜上九云，予聞之胡先生曰“天之衢，亨”，誤加“何”字。於夬九三云，安定胡公移其文曰“壯於頄，有凶。獨行遇雨，若濡有愠。君子夬夬，无咎”。於漸上九云，安定胡公以“陸”為“達”。考《伊川年譜》，皇祐中游太學，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，得先生試文，大驚，即延見處以學職。意其時，必從而受業焉。世知其從事濂溪，不知其講《易》多本於翼之也。其說為前人所未及，今核以《程傳》良然。《朱子語類》亦稱：胡安定《易》分曉正當。則是書在宋時，固以義理說《易》之宗也。王得臣《塵史》曰：安定胡翼之，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。朝廷命主太學，時千餘

士，日講《易》。是書，殆卽是時所說。《宋·志》載瑗《易解》十卷、《周易口義》十卷。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引李振裕之說云：瑗講授之餘，欲著述而未逮，其門人倪天隱述之。以非其師手著，故名曰《口義》。後世或稱《口義》或稱《易解》，實無二書也。其說雖古無明文，然考晁公武《讀書志》有云：胡安定《易傳》，蓋門人倪天隱所纂，非其自著，故序首稱先生曰。其說與《口義》合。又列於《易傳》條下，亦不另出“口義”一條。然則《易解》、《口義》確爲一書明矣，《宋·志》蓋誤分爲二也。

問題一

“邵伯溫《聞見前錄》記《程子與謝湜書》，言讀《易》當先觀王弼、胡瑗、王安石三家”。

查邵伯溫《聞見錄》，沒有此記。邵博《聞見後錄》曰：“伊川又與伊川族弟穎善，穎知好《大學》，伊川於其眷中，獨與之言《易》。嘗從穎得書疏一通，伊川手跡也，曰：爲《易》學者，但取王輔嗣、胡先生、王荊公之說讀之，無餘事矣”。邵伯溫父子二書中根本沒有“謝湜”二字。四庫館臣於《伊川易傳》提要中仍曰：“今考程子《與金堂謝湜書》，謂《易》當先讀王弼、胡瑗、王安石三家。”探其原始，此說出於《文公易說》。曰：“伊川先生《與謝湜持正書》曰：若欲治《易》，請先尋繹令熟，且看王弼、胡先生、王介甫三家。”然而，此說本出於程頤給其族弟程穎的“書疏”之中，《二程遺書》記謝湜事只有一條：“謝湜自蜀之京師，過洛而見程子。子曰：爾將何之？曰：將試教官。子弗答。湜曰：何如？子曰：吾嘗買婢欲試之，其母怒而弗許，曰吾女非可試者也。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，必爲此媿笑也。湜遂不行。”《二程外書》記謝湜事也只有一條：“蜀人謝湜提學，字持正，解《春秋》成，來呈伊川。伊川曰：更二十年後，子方可作。謝久從伊川學，其傳竟不曾敢出。”顯然此傳說之訛，先是朱熹“程冠謝戴”，而後則是四庫館臣以訛傳訛。

問題二

三原劉紹攽《周易詳說》一書，今已不可見。以《周易口義》內容與其說對比，大致符合。

1，提要：“居上爲天下之表儀”。

《周易口義》曰：觀於天下，使天下之人莫不仰觀而化之也。

臨制天下，則天下之人仰以法之，皆以孚信而應之。

2，提要：胡先生曰“天之衢，亨”，誤加“何”字。

《周易口義》曰：經文有“何”字，推尋其義，殊無所適，蓋傳寫者因象辭有之，故遂

加之也。

3，提要：胡公移其文曰“壯於頄，有凶。獨行遇雨，若濡有愠。君子夬夬，无咎”。

《周易口義》曰：此一爻有錯倒之文，當曰“壯於頄，有凶。獨行遇雨，若濡有愠。君子夬夬，無咎”。

4，提要：安定胡公以“陸”爲“達”。

《周易口義》曰：今考於經文，“陸”字當爲“達”字。

既然所引三原劉紹攽《周易詳說》之說與《周易口義》大致符合，則提要所引“考《伊川年譜》”之前的一段內容，就沒有多大的意義。

問題三

提要：《朱子語類》亦稱：胡安定《易》分曉正當。

查《朱子語類》，有以下數條：

看《易傳》，若自無所得，縱看數家，反被其惑。伊川教人看《易》，只看王弼注、胡安定、王介甫解。

有人問程子，胡安定以九四爻為太子者。程子笑之曰：如此三百八十四爻，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。

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，若一爻作一事，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。

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。曰：《易》不可恁地看。

嘉祐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，於義理不分明，然是甚氣象？

《朱子語類》裏，有關胡瑗易學的評論只有此數條，可謂褒貶不一。就是沒有“胡安定《易》分曉正當”的話。因此，當作原文而徑直加引號，就是四庫館臣的誤導。

問題四

提要：王得臣《塵史》曰：安定胡翼之，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。朝廷命主太學，時千餘士，日講《易》。

查《塵史》原文是：“安定胡翼之，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，朝廷命主太學，時千餘士，日講《易》。餘執經在諸生列，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。”因此，此段不當作原文而徑直不加引號，仍是四庫館臣的誤導，由其引用體例不一所致。

問題五

提要：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引李振裕之說云：瑗講授之餘，欲著述而未逮，其門人倪天

隱述之。以非其師手著，故名曰《口義》。後世或稱《口義》或稱《易解》，實無二書也。

查《經義考》，原文是：“李振裕曰，《宋·藝文志》既列胡瑗《易解》，復列《口義》十卷，《繫辭》、《說卦》三卷，而《揚州志》亦仍其目，誤也。蓋安定講授之餘，欲著述而未逮，倪天隱述之。以其非師之親筆，故不敢稱《傳》，而名之曰《口義》，傳諸後世。或稱《傳》或稱《口義》，各從其所見，無二書也。”因此，當作原文而徑直加引號，又是四庫館臣的誤導。

問題六

提要：晁公武《讀書志》有云：胡安定《易傳》，蓋門人倪天隱所纂，非其自著，故序首稱先生曰。

查《讀書志》原文是：“胡先生《易傳》一十卷。右皇朝胡瑗撰。瑗字翼之，泰州人。通經術樂律，教人有法。在湖州，從其學者常數百人，成材而備朝廷器使者不可勝數。此解甚詳，或云門人倪天隱所纂，非其自著也。無《繫辭》。”倘若以“蓋門人倪天隱所纂，非其自著，故序首稱先生曰”為連句而加引號，則又是四庫館臣的誤導。

問題七

提要：“其說《易》，以義理為宗”。

四庫館臣又於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經部一易類一裏面說：“一變而胡瑗、程子，始闡明儒理。”

南宋馮椅於《厚齋易學》中曰：“宋牧，字長民，彭城人。仁宗時言數者，皆宗之。”彭城劉牧是真宗時的太常博士，著《易數鉤隱圖》一卷。胡瑗于《周易口義》中“言數”，就宗從劉牧之說。

仁宗時之胡瑗釋《易傳·繫辭》“兩儀生四象”時則曰：“言天地之道陰陽之氣，自然而生成四象，四象者，即木金水火是也。故上文謂天一下配地六生水，地二上配天七生火，如此之類，是天地陰陽自然相配，生成金木水火之象。然此止言四象而不言土者，蓋天地既判生為五行，然二氣既分，則自然生而為木金水火，則地之道本于土而成，但言四象則土從可知矣。”及釋“易有四象所以示也”則曰：“按此四象有二說，一說以謂天地自然相配，水火金木以為之象，所以示也；又一說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，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，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，剛柔者，晝夜之象也，是言大易之道有此四象，所以示人之吉凶。疏莊氏謂，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，有假像，有義象，有用象，則非也。又何氏以為天生神物聖人則之，天地變化聖人效之，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，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，

亦非也。”這些話，幾乎全脫胎於一卷本《易數鉤隱圖》之說。如果說主張“象由數設”、撰一卷本《易數鉤隱圖》的彭城劉牧是象數派，那麼胡瑗竟然宗從其象數之說而解說《繫辭》的有關章節，又如何能說他是“以義理為宗”呢？

總之，此篇提要問題多多。由此看來，校點者在《校點說明》中略加闡明《周易口義》一書的重要性，引用《聞見後錄》之說就已足夠。清代乾隆年間以紀昀為首的四庫館臣，偏重漢學而輕視宋學，於易學中表現得尤其明顯。更何況凡撰寫易類提要者無一是當時的易學家，所以寫出如此劣等的提要文字也並不奇怪。我們今天編纂《儒藏》精華編，希望校點者下工夫寫好此書的《校點說明》，以體現出當代的易學研究水平。